

戴氏三

佳

▲影印的

古今雜劇三十種

這部元人選刻的元曲，可算是元
代文學的結晶品。其中名劇，如
關漢卿的閨怨佳人拜月亭，王伯
成的李太白貶夜郎，皆海內孤本
。此劇原本影印，古雅可愛。有
王國維先生極詳確的敍錄。書共
五冊，裝布套一函。定價實洋二
元五角，特價二元。外埠函購，
可用郵票代錢。

樸社發行所啓

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戴氏三種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著 者

戴

震

校 閱 者

樸

社

出 版 者

樸

社

發 行 者

樸

社

經 售 處

北京 各省 北京 大學 出版 局

◎ 不 許 翻 印 ◎

戴氏爲學，塗徑頗繁，而造詣獨深，乃在其哲學思想，維綱所寄，實惟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二書。曲阜孔氏微波榭刻戴氏遺書，二書並錄，莫有單行。又有緒言三卷，爲遺書所未收。南海伍氏輯粵雅堂叢書始采刊之。據段玉裁證明，此實疏證初稿。今試與疏證比勘，相同者大半，而疏證組織特見精善，此則筭記之倫耳。意刊遺書時，以爲既有定本，故初稿可刪。顧所刊落之處，精義亦復闕出。粵雅存之，以見戴氏思想之進程，結撰之法則，誠卓識也。今據孔伍兩本並刊三書，以供肇摩戴氏哲學思想者，雖厥勞僅止於傳鈔，而爲用乃在於結集書冊序言，旨在提攝，彊爲者病，努力週報讀，書雜誌第十七期載胡適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一文，扼要鉤隱，足助理解，爲本書序文，尤稱其職，因移錄焉。

戴東原在中國哲學史上的位置

胡適

這八百年來，中國思想史上出了三個極重要的人物，每人畫出了一個新紀元。一個是朱子（一一三〇—一二〇〇），一個是王陽明（一四七〇—一五二八），一個是戴東原（一七二四—一七七七）。

朱子的學說籠罩了這七百多年的學術界，中間只有王陽明與戴東原兩個人可算是做了兩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

朱子承二位程子的嫡傳，他的學說有兩個方面，就是程子說的『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的方面是沿襲着道家養神及佛家明心的路子下來的，是完全向內的工夫。致知的方面是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這是科學家窮理的精神，這真是程朱一派的特別貢獻。

朱學盛行之後，大家崇拜朱子，却不了解朱子的真精神在于提倡致知窮理；明

薛儒瑄說，『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這種奴隸性質的迷信養成以後，談致知的只死守朱子的傳注，談主敬的多成了迂腐的道學先生。

所以王陽明起來，索性把格物致知的一條路子封閉了，索性專做向內的工夫。朱子說的致知是要『即物而窮其理』，王陽明說的致知是致良知，是致那不學而能的良知。他說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我們只須服從那知善知惡的良知，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不會錯的。

王學盛行之後，什麼人都可以高談心性，什麼格物窮理的話都成了陳腐之談了。王學之中，確然也出了幾個特立獨行的人物，但王學實在太容易了，弄得一班士大夫空疏不做學問。

戴東原生于朱子的本鄉，跟着朱學大儒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做過很深的朱學研究。他的學說最反對王學，而又不是朱學的復辟，頗近于朱子格物窮理的精神，而又有根本上和朱子大不同的地方。

戴東原是一個實行『致知窮理』的學者，他說人類分于天然以成性，有偏全厚薄清濁昏明之不齊，必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漸漸擴充人的智慧。這是很平常的道理。無奈程朱一派受了道家佛家的影響，把人性看作『天與我完全自足』的東西，不幸受了形氣的污壞，所以要無欲，要主敬，以恢復那原來的完全自足。這種『明善以復其初』的學說，無論是程朱的主敬，王學的致良知，都只是躲懶的捷徑，不是正路。

程朱的大錯有兩點：一是把『性』分成氣質之性與義理之性兩部分，一是把『理』看作『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

從第一個錯誤上生出的惡果是絕對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戴東原大胆地說：『理者，存乎于欲者也。』他又說，『古賢聖所謂仁義禮智，不求于所謂欲之外，不離乎血氣心知。』他有一段名言說：

『仁義禮智非他，不過懷生畏死，飲食男女，與夫感于物而動者，之皆不可脫然

無之以歸于靜歸于一，而恃人之心知異于禽獸，能不惑乎所行即爲懿德耳。

他主張血氣心知即是性；而心知輔助情欲，使能『不惑于所行』即是善，即是懿德。

從第二個錯誤上生出的惡結果是容易把主觀偏執的『意見』認作『理』，認作『天理』。戴東原說，『夫以理爲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見當之者也。』他痛論認意見爲理的大害道：

『今之治人者，視古賢聖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細隱曲，不措諸意，不足爲怪。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于義而罪之。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于上。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

這種眼光直是前無古人。戴東原指斥程朱陸王的學說，只因爲他們排斥情欲，

不近人情。他自己的政治哲學只是『遂民之欲，達民之欲』八個字。他說：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之爲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爲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爲欺僞之人，爲禍何可勝言也哉？』

戴東原既反對那『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他自己對於『理』的見解是：

『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

理卽是事物的條理。他說：

『天地人物事爲，不聞無可言之理者。』

他主張要在『舉凡天地人物事爲，求其必然不可易』——這正是科學家求知的目的。

宋儒也曾說『卽物而窮其理』，但他們把理看作無所不在的渾淪的天理，所以後來終于回到冥心求理的內功路上去。戴東原便不然，他說：

『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

『剖析至微』便是戴學的治學方法。王陽明對着竹子呆坐，如何能格物？戴氏做學問的方法所以能有大成績，正靠他凡事『必就事物剖析至微』。他曾對姚姬傳說：『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

他要人把那從剖析推求得來的見解，再用演繹的法子應用到古今的事實上去，（他所謂「道」只是日用事爲）若能條理貫通，不留餘議，方才是證實的真理，方才十分之見。這真是科學家的態度與精神。

以上所論，可見戴東原在破壞方面是攻擊宋明儒者的理欲二元論和主觀的天理論；在建設方面是提出理欲一元論，點出理義有客觀的存在並且必需客觀的

證實。他批評程朱的學派雖然同時並列致知與主敬兩方面，實際上却是「詳于論敬而略于論學」。他自己的哲學便是老實地傾向致知的方面，敬只成了求知的一個附屬條件。他說：

『必敬必正，而意見或偏，猶未能語于得理。雖智足以得理，而不敬則多疏失，不正則盡虛偽。』

他很明白他宣言，只有智慧的擴充可以解決一切情欲問題和道德問題。我們引他一段話來做他的哲學的結論：

『有是身，故有聲色臭味之欲；有是身，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具，故有喜怒哀樂之情。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後欲得遂也，情得達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盡美醜之極致，大之能盡是非之極致，然後遂已之欲者，廣之能遂人之欲；達已之情者，廣之能達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斯已矣。』

人都知道戴東原是清代經學的大師，音韻的大師，清代考覈之學的第一大師。但很少人知道他是朱子以後第一個大思想家，大哲學家。他在經學考據的方面，雖有開山之功，但他的弟子王念孫段玉裁等人的成績早已超過他了。他在哲學的方面，二百年來，只有一個焦循了解得一部分，但論思想的透闢，氣魄的偉大，二百年來，戴東原真成獨霸了！

十二，二十九。

原善自序

余始爲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戴氏三種目錄

原善

卷上

卷中

卷下

孟子字義疏證

卷上

理十五條

卷中

天道四條

性九條

戴氏三種目錄

卷下

才三條

道四條

仁義禮智二條

誠二條

權五條

附錄

答彭進士書

緒言

卷上

卷中

卷下

原善卷上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見乎天道是謂順實之昭爲明德，是謂信。循之而得其分理是謂常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德言乎不可渝也。理言乎其詳緻也。善言乎知常體信達順也。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品物者也。限於所分曰命。成其氣類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質而秀發於心徵於貌色聲曰才。資以養者存乎事節於內者存乎能。事能殊致存乎才。才以類別存乎性。有血氣斯有心知。天下之事能於是乎出。君子是以知人道之全於性也。呈其自然之符可以知始極於神明之德可以知終。由心知而底於神明以言乎事則天下歸之仁以言乎能則天下歸之智。名其不渝謂之信。名其合變謂之權。言乎順之謂道。言乎信之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俾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於所制者然之謂命。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動而輸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生約者其息。生者動而時